

高端智库谈中美经贸摩擦③

在坚守底线基础上协调利益

王孝松

中美经贸摩擦发生以来,美国国内的反对呼声持续高涨。一方面,众多美国经济学家纷纷发声,批判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美双边利益水乳交融的背景下,美国意图挑起贸易战,这不仅会损害自身利益,还会破坏全球价值链的健康成长、损害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和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另一方面,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的美国各行各业更是对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强烈抗议,在经贸摩擦刚刚升级之际,波音公司便在官网发声,警告美国政府发起贸易战将会对航空行业产生负面影响。此后,不仅大豆种植者、水产品养殖户等农业生产者对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表达了强烈不满,船舶、汽车等制造业厂商也对美国贸易政策予以强烈抨击。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民众反对本国政府发动贸易战的呼声持续高涨,一些群体已经发觉中美经贸摩擦使自身福利受损,并预期中美经贸摩擦在未来将会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因此迫切希望中美双边贸易回到正轨。这种情绪传导到政治领域,会影响到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前景,进而影响两年后特朗普连任总统的可能性,因而对本届美国政府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实际上,根据同美国各界的接触与交流,我们发现,目前美国绝大多数群体反对贸易战,只有美国政府执意走这条路。

基于目前美国各界的态度与情绪,以及美国经济受到中美经贸摩擦的负面影响,加之美国中期选举迫近,中美双方不乏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协商解决经贸领域分歧与冲突的可能性。

美方的利益诉求与经贸摩擦根源

深刻理解中美经贸摩擦的发生原因是化解冲突的关键,尤为重要的是,在把握美方利益诉求基础上揭示其挑起贸易战的真实意图。

从表面上看,美方认为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导致了巨额的美中贸易逆差,并导致美国在同中国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利益受损,因此,美方要用增加关税的方

式矫正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从深层原因来看,此次美国挑起贸易战,反映出美国对中国发展模式的不认同和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意图。美方指控中国的主要“不公平贸易行为”包括所谓的“强制技术转让”“技术窃取”、国有企业海外并购、国家的产业政策等,实际上表现出美国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抵触。在美方看来,中国现行的发展模式需要改变。

与此同时,美国对现行的多边及区域贸易体制不满,试图颠覆当前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体系,重启北美自贸协定谈判,重构国际经贸规则。美国的一些群体认为自身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利益受损,其根源在于现有的经贸规则和经贸体系不利于发达国家,需要从根本上进行变革。特朗普及其经济领导团队也认为现有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是制约美国贸易发展和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

无论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不认同,还是对现行国际经贸规则的违背,都意味着本届美国政府谋求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实现“美国优先”,而贸易战则是推动这一目标实现的重要手段。美方旨在通过贸易战对中国全面施压,试图改变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美方还企图通过向中国这一发展中大国施压,迫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接受按照西方标准重构国际经贸规则的无理要求。

因此,从美方的利益诉求来看,贸易战只是手段,美国政府希望这一手段能起到胁迫和震慑的作用,以压制中国最终回到谈判桌进行谈判。目前中国政府需要做好充分准备,在未来将要进行的双边及多边贸易谈判中坚守底线,争取更多话语权,积极协调中美双方利益,妥善化解两国经贸摩擦与争端。

在坚守底线的基础上协调中美双边利益

中美关系始终应坚持合作共赢,实现互惠互利。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彼此无法割裂,如果中美经贸关系全面破裂,将会对两国经济发展乃至全球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度非常明确,即中国不愿打但也不怕打贸易战,必要时会采取反制措施。因此,中美两

要点提示
■ 坚守底线:对美方谬论要坚决驳斥、据理力争,还原中国为推进贸易自由化、维护多边体系所做的各项努力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展示中国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坚定决心。
■ 消除误解:对美方的错误解读进行有理、有力、有节的纠错纠偏,在坚持原则基础上深入沟通,对中国发展进行权威、细致、科学的阐释,努力增强中美双方的理解与认同。
■ 正视问题:对自身存在的问题,要制定中长期的改革方案;同时,以化解和管控分歧与冲突为目标,妥善处理好经贸摩擦,创造良好的对外贸易环境,赢得未来发展的广阔空间。

国未来交往过程中,仍然要坚持合作共赢。中国不会也决不能无原则地让渡自身合法经济利益,但同时会在经贸合作中更加强调利益共享,加速诸多领域的市场化进程,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同美国等贸易伙伴进一步共同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益处。而美国也应该尊重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权利,与中方相向而行,实现互惠互利。

共同努力增强中美双方的理解与认同,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化解和管控分歧与冲突。回溯源头,直接指责中国并表明发起贸易战动因的主要文件是美国贸易代表署于3月发布的对华301调查报告和白宫于6月发布的题为“中国的经济侵略如何威胁美国和世界”的报告。这两份报告的意图在于为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的合法性提供依据,实际上反映出美国各界对中国视为未来的主要竞争对手,还反映出美方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不认同。细读报告,可以将美方指责的具体内容分为三类。一类是歪曲事实、毫无逻辑的谬论,以及触碰中国底线的指责;一类是由于价值观的差异,美方对中国发展道路产生的错误认识;一类是美方指出的中国当前仍然存在的问题,也正是未来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努力方向。笔者将应对策略概括为“坚守底线”“消除误解”和“正视问题”。对美方谬论要坚决驳斥、据理力争,还原中国为推进贸易自由化、维护多边体系所做的各项努力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对双方之间存在的一些误解,应在坚持原则基础上深入沟通,对中国发展进行权威、细致、科学的阐释,对美方的错误解读进行有理、有力、有节的纠错纠偏,努力增强中美双方的理解与认同;对自身存在的问题,要制定中长期的改革方案,以化解和管控分歧与冲突为目标,妥善解决经贸摩擦与争端,创造良好的对外贸易环境,赢得未来发展的广阔空间。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

5年前,面对扑朔迷离的世界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把握大势,统揽全局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搭建了一个开放、包容、共享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多边合作机制,陆续得到了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近年来,非洲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为非洲国家经济增长带来新的亮点和能量。中非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交流、中非学者互访等活动,中国对非洲政府官员、工程技术人员、中小非洲教师的培训以及不断增加的来华学习的非洲留学生为“民心相通”搭建了桥梁,成为中非交往中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如何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助力?这是值得关注并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

文化交流是“一带一路”框架下中非合作的重要动力

近年来,中非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渠道不断拓宽,内容不断丰富,机制不断完善。“一带一路”框架下,中非合作在多个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例如,2015年,习近平总书访问非洲并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提出了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五大支柱”和“十大合作计划”,为中非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绘制了蓝图。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非洲之行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同塞内加尔、卢旺达等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塞内加尔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愿积极参与互联互通建设;卢旺达向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者敞开了大门;南非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对接非洲发展的先行先试示范国家,同中国在投资、科研等领域展开了诸多合作。不久前闭幕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签署了近150份合作协议,特别是28个中非关系非盟委员会中方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掀起了又一波支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热潮。峰会还通过了《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两个重要成果文件,推出以实施“八大行动”为核心的上百项全面深化中非合作的新举措,为加强中非合作树立了新目标、开辟了新通道、拓展了新空间,不仅把中非合作推向新阶段,也将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中非合作论坛作为中非文化交流创新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中非合作论坛成立18年来,论坛框架下的中非合作成效显著,成果有目共睹。其中,人文交流是论坛聚焦的重要议题。2012年6月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文化部长论坛”形成了“文化聚焦”创新机制,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强调了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加强双向互动交流,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2015年12月,中非合作论坛

约翰内斯堡峰会暨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提出中非人文合作计划,有力地强化了中非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非双方应携手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为了“文化共兴”,中国决定设立中国非洲研究院,打造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增强版,实施50个文化旅游项目,支持非洲国家加入丝绸之路国际剧院、博物馆、艺术节等联盟,打造中非媒体合作网络,继续推动中非互设文化中心,支持非洲符合条件的教育机构申办孔子学院,支持更多非洲国家成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地。这一系列举措,必将对中非人文交流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

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项目落地的务实合作促进了文化与经济的融合。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成立的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信托基金(CFIT)拓展了中非文化交流的视野。这一项目设立了“教育创新”等可持续发展目标,契合了非洲国家的实际需求,为其提供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对非援助形式由双边变成多边,形成了统筹协调、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多赢局面。

孔子学院等为中非文化提供了具有系统性、可持续性的基础平台。截至目前,非洲共设立了54所孔子学院和30个孔子课堂,累计培养学生140多万人。孔子学院促进了非洲当地的师资培养、职业技能培训以及与中国企业合作等,有力推动了非洲当地经济与文化发展。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孔子学院加深了中国文化在非洲的亲力和吸引力,使得非洲人民更加了解中国,加深中非之间的理解和友谊。

基金会、智库和中非文化交流中心等合作机构进一步助推中非人文交流。如,中非友好经贸发展基金会是专注于非洲和经贸领域的基金会,不仅帮助中小企业走出国门、资助中非科技经贸项目、鼓励出口创汇,更设立了专门针对文化领域的委员会——“一带一路”国际交流基金管理委员会,对中非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中非文化交流的建议

中外智库及媒体对中非文化交流给予积极评价,认为其在建构一个更和谐、更多元、更平等的世界文化新体系。同时,一些制约与不足仍然存在,例如:与官方的交流合作相比,中非民间交往步伐仍显缓慢,中非民间各界自发组织的有序的文化交流相对较少,普通民众对于对方文化的理解还较

以厕所革命推进乡村生态振兴

孙贺

农村厕所革命本质上是一种倒逼机制下的生活方式革命,是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有力抓手。进入新时代以来,全国各地在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进程中不断积累新经验、探索新思路、创新新模式,走出了一条适合国情、具有特色的发展路子。

当前,农村厕所革命遇到的瓶颈主要在供给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动农村厕所革命,要在供给侧上下功夫,着力解决供给什么样的农村厕所产品、由谁供给农村厕所产品以及如何供给农村厕所产品等问题,不断夯实农村厕所革命的物质基础,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人居环境的需求。

在农村厕所产品供给“源”上发力。完善企业平等参与和市场准入的公平机制,通过税收、信贷等调节手段,建立并完善具有正向导向功能的激励体系,拓展厕所产业链条,创新厕所产业业态,引导各类企业积极投身农村厕所革命,切实发挥市场在农村厕所产品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探索并改善政府购买农村厕所产品的实现形式,以“项目制”方式

改造和建设。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的制度优势和乡村能人的带动作用,盘活农村信用资源和合作资源,按照共建共享原则完善农村厕所革命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创新“合作社+”等农村厕所产品内生供给模式,优化农村厕所产品供给格局。继续改进农村厕所产品供给主体结构,着力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厕所产品供给体系,切实增加有效供给。

在农村厕所产品供给“量”上发力。一是盘活“存量”,加快农村厕所改造。我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虽已达到八成,但能够真正实现无害化处理的只占六成,约有两成的厕所需要改造。对此,要做好农村厕所所改造的顶层设计和统筹部署,明确厕所所改造的技术标准和作业流程,完善厕所改造工程验收、监督和检查考评机制,推进厕所改造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二是“增量”扩容上下功夫,推进农村厕所全域覆盖。目前,约有两成的“增量”缺口,主要分布在老少边穷地区,实施难度上呈现出边际递增趋势。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大财政投入和统筹力度,稳定资金供给渠道和保障,打好组织、资本和技术的组合拳,解决农村厕所革命“最后一公里”难题。

在农村厕所产品供给“质”上发力。一是牢牢抓住厕所产品预期使用寿命,特别是经济使用寿命指标,并将其作为厕所产品选择的硬性约束条件,严把厕所产品质量关,提高

厕所产品性价比,让老百姓用上实用、耐用、好用的厕所产品。二是紧紧把握农村厕所产品的生态定位,注重其生物技术处理和废物再利用功能以及转化能力和效果,推广和使用生态环保、低碳卫生、循环绿色的现代化厕所。三是着力提升农村厕所产品的科技和信息含量,推广使用智能化、节能化、科技化的厕所产品,着力解决农村厕所改造的技术和成本瓶颈问题。把好农村厕所产品的准入门槛,绝不能把农村作为淘汰落后、粗放、低质厕所产品的“倾销地”,在农村厕所改造中大搞短期化、重复式、低水平、形象化工程。

在农村厕所产品供给机制上发力。推进农村厕所革命,要强化组织、全员、全流程、项目、规划、督查、验收等全流程的统筹与协调,形成机制合力,打通关键节点、重点领域和上下层级之间的“中阻梗”,推动运行机制、保障机制、反馈机制等有效衔接,使农村厕所革命在目标规划轨道上有条不紊地推进。要合理选

择改厕模式,对于生态环境脆弱、环境容量较小的村庄,相关政策和专项基金应适当倾斜,优先改造、建设绿色节能的厕所。其他地区要综合考虑群众接受、经济能力、维护使用等因素,因地制宜选择推进厕所革命的模式和方式,普及不同水平的卫生厕所。在资金等不确定性变量约束下,应打破基于政绩观的目标选择偏好,突出厕所产品供给对象的公平性和普惠性,探索科学合理的供给机制,减少资源浪费和厕所产品的重复性供给。

推动农村厕所革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把农村厕所革命纳入乡村全面振兴全过程中,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机结合,着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加大农村厕所革命的政策支持力度,厚植农村厕所革命持续推进的物质基础,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享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作者系吉林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以法治化保障农村垃圾治理持续性

渠澧

实现农村垃圾治理的持续性,应将其纳入法治化轨道,使具体工作的开展有法可依、有制可循。

应以专项立法的形式对农村垃圾治理中的主要问题予以统一规定。当前,我国的农村垃圾治理主要通过政策推动,在中央立法层面,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央农办等10部门于2015年出台了部门规章《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验收办法》,对各地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验收工作进行调整外,相关规定仅零星散见于《环境保护法》《农业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等各部法律法规之中,且多为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垃圾污染是目前全国各地农村所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形势严峻,治理难度大,且这项工作涉及的管理层级多,执法主体广,社会关系复杂。因此,在中央层面出台农村垃圾治理专项立法,既是推动实践之需,更是攻坚克难之迫。同时,基于中央立法程序

复杂、周期较长等因素,可以率先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对各地区的农村垃圾治理工作予以规范,通过完善立法为农村垃圾治理的推进提供制度支持与保障。

应通过职责法定来确保政府在农村垃圾治理中各项职能的充分落实,形成良好的长效治理机制。农村垃圾治理涉及各级政府以及环保、农业、城建、林业、畜牧、交通、水务、工商等多个部门。由于目前立法对于具体职责分工未有明确规定,农村垃圾治理职能交叉重叠普遍存在,从而直接导致了执法过程中互相推诿以及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的出现,应付式、走过场式执法普遍存在。在村与村交界处、城乡结合部等区域,监管真空的现象更为突出。因此,应明晰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农村垃圾治理中的法定地位、法定职能和法律责任,实现职责法定和权责明确,使农村垃圾治理成为一项常态化工作。

应当实现农村垃圾治理手段的法治化。农村垃圾的有效治理需借助多种手段,既需要市场化手段,也需要政府宏观调控;既需要奖励机制,也要有惩戒措施。但当前对农村垃圾治理的规定大多以指导思想为主,缺乏具体手段的设置。特别是对于普遍存在的农村随意倾倒垃圾、城市垃圾“下乡”等乱象,仅依靠说教教育等柔性执法手段无法有效制止,必须以合理的强制惩戒手段对垃

圾污染的制造者形成威慑。然而,相关的法律法规或对上述行为缺乏禁止性规定,或虽有原则规定却无具体罚则。法定执法手段的缺失,一方面导致了相关部门在处置农村垃圾治理现象时“束手无策”,另一方面也出现了部分地区在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私设罚款来实现管理目标的行为。对此,建议尽快通过制定专项立法或修改现有法律法规的方式,对农村垃圾治理过程中的各项执法手段予以明确,赋予相关政府必要的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权等权力。

应当以法定程序压缩农村垃圾治理中的权力寻租空间。在农村垃圾治理工作中,为确保相关资金专款专用,应当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的透明度,确立资金审批和过程的公开程序,充分接受公众和舆论监督。同时,目前各地在农村垃圾治理中开始通过购买服务引入保洁公司等第三方机构,试图以市场化的方式解决垃圾分类等难题,但政府购买服务程序却普遍缺乏规范性,为违规、垄断、暗箱操作、逆向选择等行为留下了空间。对此,建议通过立法建立规范的政府购买服务程序,通过定期检查、第三方评估和专业机构审计等程序对服务提供者进行有效监管,从而使具有实力的市场主体参与到农村垃圾治理工作中,与政府携手共破“垃圾围城”,有效提升治理效率,建设美丽宜居村庄。(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理论部主办 联系电话:010-67078979 电子邮箱:gmthinktank@126.com



总第186期,了解更多《智库》周刊内容请扫描二维码关注《智库》周刊微信公众号。